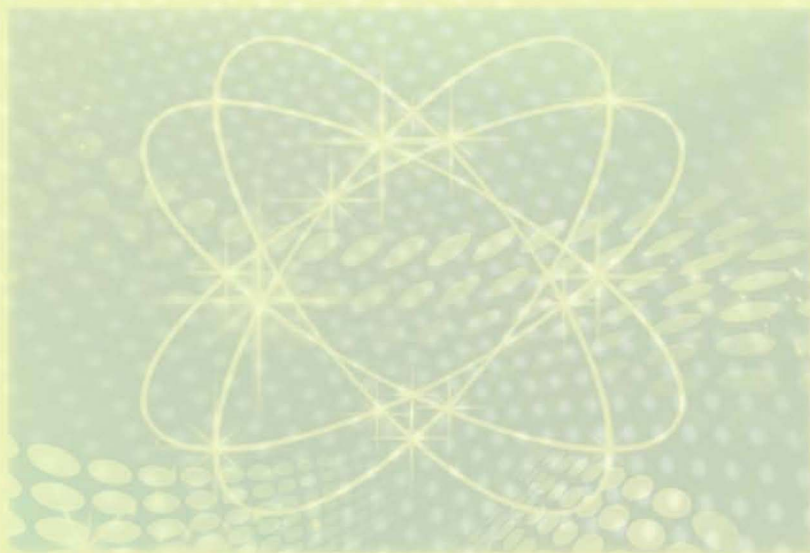


红岩事件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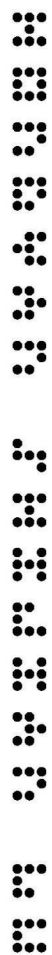
厉华主编



重庆出版社



红岩事件录



主编◎厉 华

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
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 编

副主编：余远启 吴彦来 石强桢 钟冰冰 黄小戎 傅俊弼 袁汝光 黄家玲
编委会成员：孙志慧 刘立群 田正超 周祥猷 王浩 丁颖 刘戡骏 刘和平 陈建新 王庆华 蒲勤 陈浩
陈万英 郭茜 雷学刚 巫靖 张媛媛 罗蓓莉 赵毅 邓勤 赵玫 何燕 程廉 孙传丽 李文龙 侯亚兰
胡丽 张朝雯 陈名璧 王石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岩事件录 / 厉华主编.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0.3
ISBN 978-7-229-01377-6

I. ①红… II. ①厉… III. ①历史事件—重庆市—现代 IV. ①K297.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38869 号

红岩事件录

HONGYAN SHIJIAN LU

厉华 主编

出 版 人: 罗小卫

责任编辑: 王怀龙 杨 帆

责任校对: 夏则斌

装帧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刘沂鑫 黄杨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 庆 出 版 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90mm×1 240mm 1/16 印张: 14 字数: 280 千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 000 册

ISBN 978-7-229-01377-6

定价: 5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出版说明

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成立于2007年。主要由原红岩革命纪念馆和歌乐山革命纪念馆整合而成,是以保护和利用革命文物为主要目标的文化事业单位,也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全国百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从筹备于1955年的红岩革命纪念馆,到今天的国家级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已经有五十多年的辉煌历史。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为推进博物馆事业的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历史档案文献。为了便于中外博物馆学专家和学者、现代革命史和中共党史研究工作者、图书档案工作者、红岩文化研究者和文化教育工作者查阅、学习和研究抗日战争历史及南方局历史,研究在南方局领导下牺牲在军统重庆渣滓洞、白公馆集中营里红岩英烈的相关史料,我们编写了这本书。

本书分为上、下二篇。上篇主要选取了与抗日战争及南方局历史相关的重大事件,由“从武汉到重庆”、“三次反共高潮前后”、“为和平民主的牺牲”和“重庆谈判”四个单元构成。下篇以发生在重庆歌乐山下渣滓洞、白公馆集中营的斗争为主线,将其分为“狱外事件”与“狱中斗争”。

突出事件要素,写明时间、地点、主要人物、历史影响等。

编者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准确而简略地用史实向读者介绍。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疏漏差错难免,恳请读者指正,并对在本书编写过程中给予帮助的相关单位和个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者

2009年2月

目 录

上 篇

从武汉到重庆

中共中央长江局的建立
抗战号角 人民喉舌
——《新华日报》在国统区公开出版
抗战烽火中的政治部第三厅

西迁途中的劫难——“新升降”轮被炸
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建立
红岩房东饶国模
周恩来与蒋介石“溶共”阴谋的斗争

三次反共高潮前后

国共合作的楷模——南岳游击干部培训班开课
汪精卫投敌艳电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
《重庆各报联合版》出版始末
抗战时期《新华日报》的纸张供应
愈炸愈勇的红岩人
平江惨案
邓颖超和她的母亲在红岩
三次反共高潮
叶剑英舌战群顽
“皖南事变”后的斗争
雾季公演
秘密大营救

风雨同舟——帮助中间力量建立党派
为天地存正气——何功伟与鄂西事件
南委事件
“七·九”事件
董必武拂袖参政会
南方局的整风运动
林伯渠与红岩
周恩来红岩哭父
周恩来在红岩过生日
王梓木事件
“迪克西使团”出使延安
走向世界——董必武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

为和平民主的牺牲

胡世合事件
李少石事件
昆明“一二·一”学生运动

李、闻惨案
较场口事件
“二·二二”事件

重庆谈判

周恩来在国共谈判中
抗战时期林彪的重庆谈判之行
重庆谈判(1945.8-1945.10)
毛泽东四顾特园

《沁园春·雪》在重庆文坛上引发的一场斗争
旧政协上的团结和斗争
坚持党命驻渝州

下 篇

狱外事件

西安事变
抢米事件
军统电台特支案
中原突围
“六·一”大逮捕

小民革案
民革武装斗争
《挺进报》事件
川东武装起义
大营救

狱中斗争

狱中小卖部
绝食斗争
狱中策反
狱中追悼会
春节联欢会
狱中学习

争水斗争
筑墙自围
狱中制红旗
大屠杀
虎口脱险

后 记

上 篇



从武汉到重庆



中共中央长江局的建立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前夕，武汉成为全国抗日运动的中心。为了统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发展长江流域和南方各省的抗日运动，中共中央决定在武汉设立中共中央长江局。同时组成中共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的联系和谈判，继续推动国民党的改革和进步。不久，两个组织合并，对内称长江局，对外称中共代表团。12月23日，中共中央长江局在武汉正式成立，由王明、周恩来、项英、秦邦宪、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等7人组成，暂以王明为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负责管辖云南、贵州、四川、湖北、湖南、河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省，并领导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新四军的工作。

长江局的巨大功绩：

第一，重建南方各省的党组织，训练和培养了一大批干部，使国统区党的工作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在十年内战期间，长江流域和南方各省的共产党组织被破坏殆尽。经过长江局的努力，到1938年9月，在15个地区组建了省委、省工委、地区党委、特别区（市）党委，党员发展到67780人，占当时全国党员总数的27%，为党组织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并为后来革命斗争的开展播下了火种。

第二，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发展抗战文化事业，领导国统区人民在武汉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特别是1938年4月的抗战扩大宣传周和纪念“七·七”抗战一周年的献金活动，使一个在刀光剑影下几乎窒息了整整十年的江城重新沸腾起来。长江局出版的《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高举团结抗战的旗帜，坚持民主进步精神，积极报导八路军、新四军和国民党军队的抗日战绩，起到了抗战号角和人民喉舌的作用。

第三，同国民党建立较为融洽的政治合作关系，广泛地团结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党的统战工作开创了崭新的局面。中共代表团同国民党政府开诚谈判，推动其积极抗战，对国民党其他派系和地方实力派加强联系，同民主党派的代表人物共商国是，这些活动对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坚持抗战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态势，实际上就是从这个时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第四，广交外国朋友，发展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关系，开辟了党的外事工作新战线。长江局以中共代表团名义开展的工作，改变了中共过去除苏联以外，与国际社会基本隔绝的状态。中共代表团负责人主动接触外国外交官员，与外国记者建立友好联系，热情接待参加援华工作的外国友人，通过这些活动使国际社会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抗日主张。中共代表团的国际交往，使中国共产党的外事工作有了良好的开端。

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是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管辖区内设立的一个公开办事机构。1937年9月，中共中央派董必武到武汉筹备八路军武汉办事处。1937年10月下旬，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在汉口府西一路安仁里二号成立，李涛任处长，由董必武直接领导。12月，南京失陷后，国民党政府的一些重要部门迁到武汉，各民主党派领袖、社会名流、文化界人士，全国著名抗日救亡团体也都云集武汉，武汉成为当时全国政治、军事、文化的中心。这时，原八路军南京办事处工作人员也随着转移到武汉，参加武汉办事处的工作，并正式成立第十八集团军驻武汉办事处（通称“八路军办事处”），南京八办与之合并，办事处迁到旧日本租界中街八十九号，钱之光任处长。办事处的职能部门包括总务、经理、文书、运输各科，有一个班的兵力专门负责办事处的日常保卫执勤，此外还有一个招待所，临时接待途经武汉的我党干部和一些党外友好人士、进步青年等。1937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由王明、周恩来、项英、博古、董必武等组织长江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长江局办公地点也在办事处。因此，这里既是我党当时在国统区一个合法存在的，可能也是最引人注目的联络中心，是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总部在国统区的总办事机关，也是我党一个重要的区域性指挥机关。当时，华中、东南、华南、西南各处地下党的负责人和干部纷纷前来办事处，向中共代表团和长江局汇报、联系和请示工作，与此同时，延安派往南方工作的我党高级干部，许多也曾在此停留，其中包括张云逸、张爱萍、张国华等。此外还有南来北往的我党同志，不少也通过在办事处办理必要手续后再离开。

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另外一项重要任务是为八路军、新四军筹措、转运物资。敌后抗战条件十分艰苦，枪支、弹药、药品、通讯器材等作战物资尤其匮乏，加之日顽的封锁扫荡，某种程度上，这些军需物资关系到我敌后根据地的生存和发展。尽管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根据国共合作协议下拨一些，但基于限制我抗日力量发展壮大的图谋，在数量和类型上都十分有限，为此，办事处在领取和分发下拨的物资军饷之外，还要根据我抗日军民所急需，顶住压力、各方筹措、四处组织。

不少人当时正是通过与办事处接触、了解甚至介绍，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某种意义上，办事

处成为他们光明人生大道上的一个起点或重要转折点，而终生难忘。

会战期间的武汉汇集了大批青年和学生，来自各地，其中以沦陷区如京沪、平津、东北、华北等处背井离乡而来居多，其中不少人亲身经历国破家亡，矢志报国，但一路颠簸苦于无门。我党十分重视吸收进步学生和青年参加革命队伍，根据中央的指示，著名的延安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等院校都在国统区开设了招生点，办公地点也都设在办事处内，并由长江局和办事处工作人员代为招生、考察和办理相关手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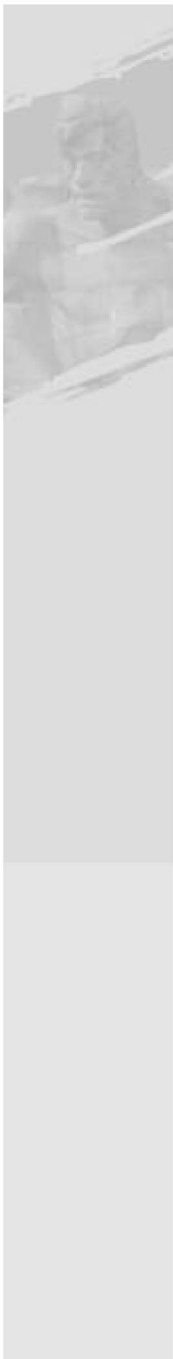
肩负此项重任之后，办事处成为了进步青年学生川流来往的聚散中心。据曾担任办事处处长的钱之光同志的回忆文章，在办事处的统一组织和协调下，“大批工人、学生和其他人员奔赴延安和抗日前线，当时常以集体形式走，以二三十人或五六十人为一批，人多时也有上百人为一批”，“他们动身前都在办事处指定地点集中，发给军服及零用钱，再送上火车”，新鲜血液就这样源源不断流入我敌后根据地，并很快散布到各个抗敌战场。

除了进步的青年学生和民众之外，办事处还精心组织、周密安排为我敌后根据地安全输送了一批积极要求投身抗日第一线的中外文化人士和技术专家，其中包括在建国后为我国机械工业作出了奠基性重要贡献的沈鸿以及医疗专家何穆、文艺创作家陈学昭、光未然、著名的台湾爱国诗人邱逢甲的儿子邱琮等。众所周知的国际友人白求恩、柯棣华、埃德加·斯诺、著名摄影家伊文思等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也都是经由武汉办事处先后抵达延安或我敌后根据地的。

此外，办事处还积极参加了当时在武汉举行的各种抗日救亡活动，包括集会、游行、演讲、典礼、歌咏会、追悼会、公祭、慰问活动、宣传周活动、募捐活动等等。在当时举行的声势浩大的“七·七”献金活动中，中共中央长江局、办事处广大干部与战士始终站在活动的前列，在自身经济条件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尽己所能、倾己所有，积极参加捐献。在活动中，周恩来将作为政治部副部长一个月的薪金全部献出，而全体八路军指战员则节食一天，并由李克农代表叶剑英作为八路军代表捐献了 1000 元，武汉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也都献出了一个月的生活费。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积极参加这些活动，对扩大我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在国统区的广泛影响、激励中国军民的爱国抗敌热情、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心、维护和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38 年元月，新四军军部迁往南昌后，由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代办新四军驻汉办事处的一切工作。这时的武汉办事处，对外作为我军驻在国民党临时首都的公开机构，但实际上是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领导和联络的中枢。1938 年 10 月武汉失陷，办事处撤销。

抗战号角 人民喉舌——《新华日报》在国统区公开出版



《新华日报》是在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发行的大型机关报,也是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唯一公开出版的大型日报。1937年10月筹备于南京,因故未能出版。迁武汉后,社址先设成忠街53号。1938年1月11日正式创刊,报社迁设于汉口大陆里。发行部则设在大陆里临街的平房内(原建筑已改建)。该报在武汉期间,属中共长江局领导。创刊后的《新华日报》努力宣传全国团结抗日的重要性,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犯下的罪行,全面报道中国军队在各个战场的作战形势和战况,特别是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敌的事迹,引导民众正确认识战争的性质和中国人民争取胜利的道路。《新华日报》还刊载毛泽东的重要著作,如《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以小册子形式出版了《论持久战》。同时,《新华日报》还发表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博古等中央负责同志的文章,鼓舞大后方民众坚持抗战的决心和信心。

1938年8月1日,《新华日报》迁至汉口府东五路150号办公(现位于汉口民意一路大陆里4—9号)。同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报社迁重庆出版。社长潘梓年,总经理熊瑾玎。历任总编辑有华岗(华西园)、吴克坚、章汉夫等。此后,《新华日报》按照党中央和南方局的要求,坚定地宣传党的正确路线,冲破国民党的层层封锁和歪曲,大量报道八路军、新四军对日作战的真实情况,扩大了中共抗日武装力量的影响;及时报道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军民的抗战业绩和建设成就,及时宣传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深入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制造分裂、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罪恶行径,有力地促进了国统区的抗日民主运动。《新华日报》也因此成为抗战时期党在国统区领导抗战的一个重要阵地。全党整风运动开始后,《新华日报》以整风精神改进工作,尽力扩大与加强各方面群众的联系,反映社会各界的要求和呼声。国民党顽固派对《新华日报》百般仇恨,实施捣毁报社、扣发稿件、禁售报纸、殴打报童等种种迫害行为。报社人员在周恩来等人的正确领导下,同国民党当局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将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巧妙结合起来,冲破新闻检查制度,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大后方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一面旗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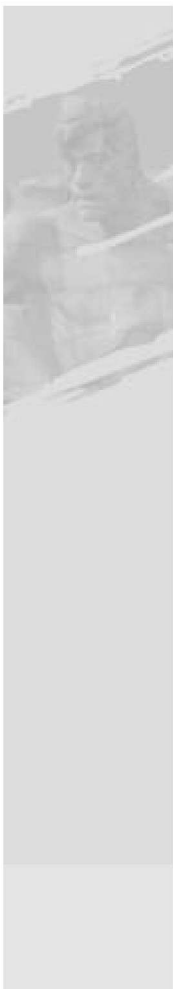
抗战胜利后,《新华日报》按党的要求,积极宣传党的和平、民主、团结的三大口号和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揭露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在美国政府支持下,假和谈真内战,实行独裁,践踏民主的反动行径,宣传和报道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以及党领导人民军队在自卫战争中取得的战果。

1945年9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决定在上海设总馆,在南京、重庆设分馆。其中,重庆分馆改为四川省委机关报。后因国民党当局阻挠,上海、南京两版的出版计划未能实现。重庆分版先后由傅钟、张友渔任社长,熊复任总编辑,于刚任经理。继续出版至1947年2月28日,被国民党当局封闭。抗日战争时期,还出版过《新华日报》华北版,为中共北方局机关报;后改为太行版,为中共太行分局机关报。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出版过《新华日报》华中版,为中共华中分局机关报。1949年4月30日在南京创刊的《新华日报》,为中共南京市委机关报。1952年11月起改为中共江苏省委机关报。1949年12月10日在重庆创刊的《新华日报》,是中共中央西南局机关报,至1954年8月31日因大行政区撤销停刊。

《新华日报》针对国民党统治区的实际情况,正确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路线和方针政策,努力把马列主义的真理传播到人民群众中去。宣传的内容,在抗日战争时期,主要是:宣传全面抗战和持久战的路线;反对片面抗战和投降倒退。宣传中国共产党实行民主政治、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反对国民党当局的独裁专制和特务统治。在国际问题上,支持苏联以及英美等国的反法西斯战争。抗日战争胜利后,宣传的主要内容是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反对内战的方针。揭露并反对国民党独裁的反动政策,反对美国的侵略阴谋。支持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这些真实、正确的宣传报道,教育了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群众,赢得了广泛的同情和支持。曾被毛泽东、周恩来称赞为八路军、新四军之外的又一支方面军。《新华日报》的宣传方针是在宣传报道中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作中光明磊落的态度。积极报道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武装力量英勇抗击日军的战绩,同时也如实反映了国民党爱国将士在正面战场的抗战事迹;它发表过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彭德怀、叶剑英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许多重要文章;对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高级领导人的抗日言论,也以热情欢迎的态度予以登载。在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爱国民主统一战线方面,《新华日报》也做了大量工作。用大量版面,为民主党派和各界知名人士提供一个比较自由的讲坛。冯玉祥将军和郭沫若、茅盾、柳亚子、沈钧儒、黄炎培、邓初民、陶行知、张西曼、胡厥文、胡子昂等学者、教授和社会活动家,经常为此报撰稿。马寅初曾在“友声”专栏发表文章,痛斥国民党的腐败,呼吁“建立一个真正民主的国家”。它的副刊是进步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团结了一大批优秀的文学艺术和文

化工作者。它的国际报道也很有特色。1942 年底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开设了“国际述评”专栏,由乔冠华主笔。这个专栏的文章以资料翔实、分析透彻、富于哲理和文采而受到读者欢迎,经常为外国通讯社所转载。1942 年中国共产党整风期间,《新华日报》按照“增强党性、反映群众”的方针,在广泛征求读者意见的基础上,于同年 9 月实行改版。从此进入成熟发展的阶段,并加强了办报思想的建设。1947 年 1 月,在创刊 9 周年的时候,发表编辑部文章《检讨与勉励》,全面阐述“人民的报纸”的思想,丰富了民主革命时期中国无产阶级新闻理论的内容。

抗战烽火中的政治部第三厅



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是 1938 年初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在武汉成立的,由陈诚任部长。政治部下辖 4 个厅,即总务厅、第一厅、第二厅和第三厅。总务厅主管本部总务人事、经理、纪律等事宜;第一厅主管军队政治训练及军事学校政治训练事宜;第二厅主管民众运动及国民军事训练事宜;第三厅主管宣传事宜。1938 年春,经蒋介石和陈诚提出要求,经中共中央同意,由周恩来担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主管负责宣传和文化工作的第三厅。蒋介石和陈诚又邀请郭沫若任第三厅厅长。蒋介石、陈诚邀请在全国政治、思想、文化界威望很高的周恩来、郭沫若担任要职,企图收揽人心。

1938 年 4 月 1 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在武汉成立,由共产党领导下的进步人士组成。厅长是郭沫若。最初设五、六两处,以后又增设第七处,组织机构较一、二两厅为大。五处处长胡愈之,六处处长田汉,七处处长范寿康。三个处分管动员工作、艺术宣传、对敌宣传等业务。其中第六处掌管艺术宣传,由田汉任处长,下设三科:第一科科长洪深,管戏剧音乐;第二科科长郑用之,管电影;第三科科长徐悲鸿,管绘画木刻。厅长办公室主任秘书阳翰笙,科长有洪深、杜国庠、郑用之、冯乃超等人。该部成立之初,组成人员除国民党各派系人物外,还有周恩来以及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进步人士参加,故一时呈现出团结合作抗战的生机勃勃的景象。在周恩来、郭沫若直接领导下,以共产党人为核心,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民主人士参与的第三厅,利用其为国民政府的军事机构,合法地进行抗日宣传,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强堡垒。

郭沫若在担任厅长期间为三厅工作殚精竭虑，他从抗日救亡出发，把当时已聚集在武汉的文化英杰，尽可能请到三厅来，共同为民族生存、抵抗侵略而尽力，并干出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业绩。

三厅成立后不到十天，周恩来发表了《怎样进行二期抗战宣传周工作》的文章，并与郭沫若及三厅人员共同研究如何做好工作并扩大宣传效果。提出的要求是：文字口头宣传具体生动，艺术演出通俗易懂、深刻感人。宣传周共六日，每日都有主要项目。其中以戏剧日、电影日、美术漫画日、游行日最具特色。

4月7日，周恩来在宣传周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并要求把宣传周扩大到全国去。此时正值台儿庄大捷的消息传到武汉，一扫自南京失守后不少人失去胜利信心的低沉气氛。周恩来与郭沫若商议立即派宣传人员赶往台儿庄慰问前线战士，使宣传深入军队。

4月8日是口头宣传日，郭沫若邀请在武汉的国民党党政军要员和社会名流冯玉祥、邵力子、张之江、黄琪翔、史良、邹韬奋、于右任、陈铭枢等人进行广播演讲或公开演讲，组织起3000多个宣传队到武汉三镇的大街小巷和市郊进行街头演讲，并深入到伤兵医院、难民收容所等处进行抗战宣传。在9日的歌咏宣传日，民声歌咏队、星海歌咏队、量才歌咏队、青年女子歌咏社等100多个歌咏团体，分头上街演唱《义勇军进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大刀进行曲》、《保卫大武汉》等抗战歌曲。在汉口中山公园的人民体育场内，还举行了由冼星海、张曙任正、副总指挥的万人大合唱。一时间，“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打回老家去……”等歌声此起彼伏，响彻了整个武汉的上空。美术宣传日，在武汉的美术工作者创作了数百幅抗战宣传画，陈列在武昌黄鹤楼旧址的两侧和台阶上，并在武汉三镇的大街小巷的醒目处绘制许多巨幅壁画和漫画。戏剧宣传日，武汉各戏院昼夜连场免费上演具有爱国主义的戏剧，如《前夜》、《东北之家》、《打鬼子去》、《放下你的鞭子》、《岳飞》、《八百壮士》等。参加演出的有三厅所属各剧团及上海等地的救亡剧团。在电影宣传日，三厅统一部署武汉所有的电影院都交替上演宣传抗日的《火中的上海》、《保卫我们的土地》、《抗战特辑》等影片。同时，郭沫若还组织了几个电影巡回放映队到三镇大街小巷为民众放映。13日是宣传周的最后一天，是游行宣传日。为组织好游行，郭沫若等除广泛发动武汉各界民众积极参加外，还指导戏剧、美术等团体组织化装、彩扎游行队伍。这天虽风雨交加，但群众热情很高，有数十万人参加了游行，武汉三镇彩旗飘扬，歌声不绝，口号声如雷，盛况空前。

日军侵华势力逼近武汉，武汉危急。郭沫若与文艺界的主要人士，共同商议，将聚集在武汉的文艺大军，根据各人的不同情况，迅速分散为几股力量：一部分

人由政治部三厅组建十个抗日救亡演剧队，分赴各地，包括国民党管辖的各战区及抗日军队，深入进行抗日宣传活动。许多知名的文艺家在那时都曾参加过救亡演剧队，如张光年、崔嵬、张瑞芳、丁里、王唯一、吕复、田冲、夏淳、朱琳、胡宗温等数百人。周恩来曾给演剧队员作报告，鼓励队员们坚定抗日的信心和决心，并提出演剧队不单是抗日宣传队，而且还是深入群众的工作队。救亡演剧队迅速分散深入各战区及敌后。八年抗战中，无论环境多么困难，他们始终坚持抗日工作，直至抗战胜利。有些队则坚持到全国解放。队员中不少人成为建国初期全国各地、各大城市文化艺术部门的领导和艺术骨干。

对日宣传和国际宣传是三厅的一项重要工作。为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先后在日本待过二十多年精通日语的郭沫若，聘请了鹿地亘夫妇和绿川英子女士。他觉得对敌宣传单靠几个从日本回来的留学生是不行的，一定得请些土生土长的日本朋友来帮忙，他们的声音纯正，宣传效果要好些。于是郭沫若想到了鹿地亘这位老朋友。鹿地亘生于1903年，早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由于一直从事反战创作，长期被日本反动当局监禁在狱中。出狱后，他于1936年1月和夫人池田幸子流亡到上海，从事中日文化交流工作，致力于《大鲁迅全集》的编译。抗战爆发后，他流亡到香港，过着十分清苦的生活。郭沫若提议他们夫妇二人均为厅属设计委员。在以后半年左右的时间里，鹿地亘与夫人池田幸子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武汉的抗日救亡工作，他们参加各种集会，以日本公民的身份，用切身的感受痛斥日本法西斯的种种罪行，鼓舞人民奋起斗争。夫妇二人共同出席14团体欢迎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代表大会，呼吁世界舆论支持中国人民的反战斗争。此后，他们还应邀赴戏剧训练班讲课，到湖南常德的军政部第二俘虏收容所对日俘作反战教育工作，冒着战火随武汉前线慰问团赴长江南岸前线慰问。除了参加这些公开活动外，他们还坚持在三厅对敌宣传处的日常工作，坚持在播音室里每周与青山、绿川英子轮流作日语对敌广播。这种用日本人来进行对日宣传的办法，收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由于在郭沫若具体领导下的第三厅抵制国民党错误的方针政策，而主要是按共产党的方针政策行事，国民党就加紧控制第三厅。1940年夏，蒋介石等企图胁迫在第三厅工作的文化人士集体加入国民党，当遭到以郭沫若为首的绝大多数第三厅工作人员严词拒绝后，就改组了第三厅，而对被排斥的郭沫若、阳翰笙等大批进步文化人士，则实行羁縻政策，在政治部之下，另设文化工作委员会，作为学术研究团体，规定“只能做研究工作，不能从事对外政治活动”。

西迁途中的劫难——“新升降”轮被炸

1938年10月，武汉已陷入日军三面包围之中。武汉三镇危如累卵。周恩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全权代表，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又是中共中央长江局和《新华日报》的主要负责人，在日军逼近武汉的情况下，临危不惧，经常彻夜不眠，组织群众撤退，转移输送党的干部和物资，组织出版了最后一期《新华日报》，这一期报纸上还有他口授的《暂别武汉》社论。他一直坚持战斗到武汉失守前几个小时。

10月22日，日军逼近武汉，日本飞机轮番轰炸，形势十分紧急。下午4时在周恩来的送行下，由十八集团军驻武汉办事处处长李克农和《新华日报》社长潘梓年两人负责，率领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最后一批工作人员乘“新升降”轮撤离武汉，西上重庆。同乘“新升降”轮的有长江局负责同志钱瑛，东北义勇军司令员李延禄，有王炳南及其夫人王安娜，以及加拿大护士简·尤恩。

“新升降”轮是我党通过进步人士的关系租来专用的，吨位很小，载有人员约100余人，还装有印刷器材、纸张，已显得很拥挤。当船要起航时，又有几十位无法买到船票而又无力买船票的难民和难童纷纷要求搭船离汉。根据周恩来“能多救一个难民就多救一个”的指示，同志们宁愿自己挤一点，也要满足难民搭船的要求。

第二天上午9时许，船行到湖北省嘉鱼县境内长江北岸的燕子窝。在武汉时，已得知日军飞机封锁长江，欲炸毁船只；为避免日机轰炸，李克农通知停船靠岸，除留少数人员值班外，其余全部上岸，疏散到附近村庄，防避空袭，等天黑后再开船。上岸人员还分成几个小组，向当地群众宣传抗日。

下午3时半，未见日军飞机来袭，大家便陆续往回走，李克农等仍在江边茶棚休息。一些人上船后或洗澡擦身，或躺在铺位上休息。

忽然听到飞机声，四架日军飞机霎时飞临上空，在船顶上盘旋两圈，猛然俯冲，连投几枚炸弹，有一枚燃烧弹投中轮船，前舱立即起火。敌机又轮番低飞扫射，肆虐二三十分钟。

敌机飞走后，经当地渔民和会游泳的群众努力抢救，部分船员和乘客幸免于